



修缮一新的清官亭公园。

不得不说的王禹甸

曹阜全 文/图

“者点水无多，一官已留清白去；此间尘不染，何人更踏软红来。”

在清官亭正殿的匾额上，挂着这样一副对联，由昭通著名书法家吴希龄用草书写就，是对一位在昭通城为官清廉的人物的讴歌，希望后人承前启后，继往开来，树立清廉典范。

清官亭位于昭阳区公园路北侧，本来不属于老城的范围，但清官亭与古城联系紧密。建城之时，从大龙洞引利济河水进城，除了沿城北的二十五孔桥（又名卧虹桥）引水到省耕塘外，昭通城的主要用水就是将利济河水经城西北的官坝，通过官沟把水引至上水塘、下水塘。河水引进古城之前，先要经过三多塘。后来，三多塘多次更名，最终确定为现在的清官亭公园。据调查，昭通的清官亭公园是全国唯一以清官亭命名的公园。

古代的清官为数不少，大至宰相如狄仁杰、包拯、海瑞、于成龙等，小至县令如西门豹、陶侃等，但历史上的昭通，地处西南边疆，也算边远化外之地，居然出了一个清官，是一件值得记住的事。

这里想介绍的“清官”叫王禹甸。旧志对王禹甸的记述字数不多，语焉不详。王禹甸的职务是知县，但《恩安县志》甚至没有把王禹甸列入恩安知县的章节。在《昭通志稿》“官师”一节终于把王禹甸作为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的知县列入，写明籍贯山东。“循绩”一节终于有了明确表述：王禹甸，陕西三原举人，嘉庆十三年任恩安事，有侠气。尝讨缉盗贼，境内肃然。审判设狱，鲜有留滞。兴修水利，改建龙神祠于城外，人号为“清官亭”云。对王禹甸的籍贯，其他志书里也有记载，称王禹甸字奕山，浙江山阴县人，监生……但对王禹甸在恩安任职及所做之事并没有记录。因此，对王禹甸有点雾里看花，人云亦云的感觉。

王禹甸在昭通做的事不少，《昭通志稿》的记录，当可采信。当然，被老百姓最为夸赞的，是王禹甸到任恩安知县后，为了缓解昭通城饮水困难，与当地士绅和百姓共同商量，听取群众意见，在修建上水塘、下水塘的基础上，于嘉庆十四年（1809）又在城西北扩修了一个水塘，因该水池及附属设施为大家共同商量所

建，所以王禹甸“看多、做多、商量多也”的座右铭取名“三多塘”。所谓看多，就是要多读书、多学习、多观察、多思考，多调研走访。所谓做多，就是多做事，在办事中历练自己，服务大众，多做好事、多做实事，不能空谈。所谓商量多，就是要集思广益，多听取大家意见，不能独断专行。而老百姓则把“三多”理解为“多福、多禄、多寿”。三多塘建成不久，王禹甸任满离开。3年之后，昭通遭遇大旱，上水塘、下水塘完全干涸，好在有三多塘，解决了全城居民的生活用水，起到了保障性的作用，因此，老百姓十分怀念带领修建三多塘的王禹甸。建三多塘时，王禹甸还安排把旁边的龙神祠进行培修，在水池中建了一个亭子，回廊水榭，石桥相通，用以祭祀龙神。老百姓感念清正廉洁和为民办事的王禹甸，就把祭祀龙神的亭子更名为“清官亭”。从此，王禹甸以及清官亭声名远播。以人民为中心，想群众之所想，急群众之所急，是大家记住王禹甸的主要原因。

据旧志载，三多塘的修浚经历过若干阶段，最先是知府徐德裕“引泉开沟

渠”，1762年，知府傅坚倡议，恩安知县胡泉和汪任响应，动员民众捐资，扩建并疏浚三多塘，于1763年夏天完成，“长十七丈，阔四丈，深六尺”。后来，又有多位官员对三多塘进行疏浚，增建假山、楼榭等景观，改建成公园供百姓游玩，对公园名称也多次进行变更，比如清光亭、卫泉公园、红旗公园，但老百姓就是不认可，仍然称为清官亭。

近年来，公园又进行了提升，对清官亭做了修缮。2023年下半年，为纪念王禹甸的清廉事迹，弘扬廉洁文化，又把清官亭打造为廉洁文化主题公园，亭内用图片、视频的方式介绍王禹甸的事迹，对莲园、树园、竹园进行了提升改造，增加了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的碑刻，新塑了王禹甸雕塑，把全市重要的文物古迹、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、产业成果等“请进”公园，用专栏展示，派专人讲解，营造清廉昭通的浓厚氛围，把“清官”精神传承发扬下去，把公园打造成名副其实的清官亭，赋予清官亭新的时代内涵。

其实，对王禹甸这个人，我们还很陌生，还有许多不了解的地方，包括志书所

载的相关事迹，也没有具体的内容作支撑。在昭通，王禹甸既不像徐德裕、龙文、傅坚等人任过知府，其官职只是一个知县，却能被一方百姓记住。而且，到今天为止，王禹甸到底长什么样子，是山东人、陕西人还是浙江人，也还没有定论。他这个“清官”的称号不是朝廷封授的，而是老百姓封赠的，甚至写不进史书中，但我们仍然忘不了他，清官亭就是对他最大的认可。

写本文的目的，是希望来到昭通的朋友，在游历古城之后，能再到清官亭走走，了解一下三多塘的来历、清官亭的故事，更重要的是知道这一方土地曾有一个从中原大地来，任过恩安知县的王禹甸，他在有限的时间内做了不少为民称道的事，也让全国更多的人知晓昭通有座清官亭，知道有一个叫王禹甸的清官，让更多的干部知道清廉为官、公正办事的道理，真正把王禹甸倡导的“三多”做法落实到为人民服务的实践中去。



之九

王禹甸事略

蒋永楨

王禹甸（1768—1825），字奕山，号柳之，浙江山阴人，监生（并非陕西三原举人，详见《王禹甸履历籍贯考》一文）。清嘉庆元年，清廷为镇压白莲教筹集军费而新开川楚事例，王禹甸捐知县分发云南。嘉庆五年，王禹甸抵达昆明候缺，嘉庆六年署理寻甸州知州，嘉庆七年调署师宗知县兼摄丘北县县丞。

嘉庆八年，清廷稽察云南官员逾限情况，王禹甸与黑盐井提举唐祖榭、平彝县知县王子音、丘北县县丞张登第、顺宁县（现在凤庆县）知县张德基等官员同时被参革职。嘉庆十一年，云贵总督伯麟经过调查，得知王禹甸被参交代逾限年月不符，移请稽察房核查，经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善查明属实，又请旨将应更正之处移交吏部和户部核办，全部查实后予以开复，依旧发往云南差委。

嘉庆十三年四月，王禹甸再度抵达昆明，委署昆阳州知州，不久调署恩安县知县。恩安为昭通府城附郭，地处高原，无河无井，而城中居民数万，水源只

得依赖距城20里的龙洞水，用水极为困难（距大河10余里，关以内无井泉），历任官员因为客观因素所限，迟迟未予解决。

王禹甸到任后，士民纷纷反映用水问题，王禹甸便召集士绅，经过反复商议和仔细勘察，决定掘池蓄水并带头捐资，在城北兴建一个大水塘，引入龙洞水蓄水，既方便城外之人取用和浇灌，又可以解决城中居民用水困难。

政令一出，士民争相出力，仅用5个月便告竣，并取名“三多塘”，解决了困扰昭通府城数十年的用水问题。恩安盗匪横行，诉讼纷繁，针对这一特殊情况，王禹甸严查盗贼，审理积案，尽最大努力维护地方稳定。

嘉庆十四年，王禹甸调署昆明县知县，而此时宾川屡遭灾害，又遇瘟疫，民怨沸腾，暗潮涌动，四川白莲教起义被镇压后，教徒朱九桃趁乱潜逃至宾川，普安州流民阳党中认为朱九桃有利用价值，称其为明室后裔，暗中收纳流民，预谋起事。嘉庆十五年正月二十日，张俞等人胁迫各村居民参与，不料被告发，随即行动提前，云贵总督伯麟急忙调军镇压，王禹甸亦随军出征，其作战勇猛，指挥裕如，战斗中抓获首领李添等18人，朱九桃、张俞等主要人员也先后被擒。

在宾川起事之前，阳党中已回普安，伯麟侦知后，即差王禹甸率千总平安邦领兵前往捉拿阳党中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王禹甸下令官兵一律着便衣，轻装前往贵州秘密查访，二月便将阳党中捉拿解省（改装易服，星驰赴黔，将阳党中拿获解滇，使首逆不致漏网，并获紧要从犯多名，实属出力），王禹甸因功赏戴蓝翎。嘉庆十六年三月，王禹甸因为能力突出，提补宣威州知州，不久又调任易门县知县。嘉庆十八年，王禹甸奉委运送京铜，嘉庆二十年安全到京，此时广东佛冈厅同知福荫调升山东蒲州府知府，同知一职由张燠暂署，而佛冈在嘉庆十七年才设厅治，乃新设之缺，归广东布政使直管，辖境旧为南越之地，因此地山深林密，民风彪悍，最容易藏奸匿匪，此等官缺选官尤为重要，往往以有行政经验、擅长剿匪缉盗和勤劳干练之员充任，考虑到王禹甸在滇履历和剿匪的经验，清廷决定将其调任该职。同年十月，王禹甸到任佛冈，因为是新开之缺，学堂未开，民智未启，王禹甸随即着手创建培英书院，带头捐助膏火，率士绅修筑文昌宫和奎星阁，聚集生员讲学，同时改建大庙峡土神祠以定民志。为发展地方经济，方便商旅往来，王禹甸倡建桥于九围堡，民思其惠，称之为“王公桥”。王禹甸还先后在龙蟠汛和五里这类要隘修筑烽火台和瞭望台，并派兵驻扎，工作之余则亲自巡历各乡，访察匪类，先后捕获盗犯薛亚来、朱仁养等人。王禹甸十分关心百姓疾苦，任佛冈同知前后将近10年，每年冬月，必率领士绅和官吏给老弱穷民捐助棉衣和口粮。道光五年，王禹甸因下乡缉盗感染风寒，同年九月六日，病故于佛冈。



王禹甸塑像

王禹甸

王禹甸，陕西三原人，清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受署昭通府恩安知县，其为官清廉，带头捐资建设储水池“三多塘”，让恩安百姓在三年后的大旱时免去了干涸之苦。



伫立在一池清水中的清官亭。